

鬼使山庄

阿莫斯·奥兹短篇小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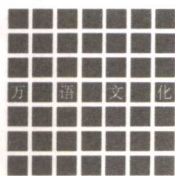
〔以〕阿莫斯·奥兹著 陈腾华译

当代以色列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2005年歌德文化奖得主

作为一个目睹以色列建立并同她一起成长的
希伯来语作家，奥兹不仅借主人公之口抒发
出自己强烈的爱国之志，同时也表达出以色
列左翼作家对和平的强烈渴望。



Amos Oz



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

鬼使山庄

阿莫斯·奥兹短篇小说集

〔以〕阿莫斯·奥兹著 陈腾华译

南海出版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4-6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使山庄/(以)奥兹著;陈腾华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6. 6

(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

ISBN 7-5442-2713-8

I. 鬼... II. ①奥... ②陈...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以色列—现代 IV. 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9351 号

THE HILL OF EVIL COUNSEL © 1976 Amos Oz

English translation © 1978 by Chatto & Windus Ltd and Harcourt Brace

GUISHI SHANZHUANG

鬼 使 山 庄

丛 书 名: 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

作 者: [(以)阿莫斯·奥兹]

译 者: 陈腾华

策 划: 万语文化

责任编辑: 杨 雯

特约编辑: 吉 默

装帧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66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2713-8

定 价: 22.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阿莫斯·奥兹(1939-)，以色列文坛最富影响力的优秀作家，也是最具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生于耶路撒冷，14岁开始以色列集体农场生活。毕业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主攻哲学和文学。后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获硕士学位。现居坐落于以色列南方沙漠中的小城阿拉德，是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终身教授。

奥兹迄今已发表了十一部长篇小说：《或许在他方》(1966·中译本《何去何从》)、《我的米海尔》(1968)、《触摸水，触摸风》(1973)、《完美的和平》(1982)、《黑匣子》(1987)、《了解女人》(1989)、《第三种状态》(1991·英文版1993)、《莫称之为夜晚》(1994)、《地下室中的黑豹》(1995)、《一样的海》(1998)、《爱与黑暗的故事》(2002)、三个中短篇小说集：《胡狼嚎叫的地方》(1965)、《一

直到死》(1971)、《鬼使山庄》(1976)、杂文、随笔集：《在炽烈的阳光下》(1979)、《在以色列国土上》(1983)、《黎巴嫩斜坡》(1987)、《天国的沉默》(1993)、《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1994)、《故事开始了》(2000)、儿童文学作品：《索姆哈伊》(1978)等。

左派的奥兹强调要理智地认识以色列历史和政治。作为1977年开始的以色列「今日和平」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批评文章和政治活动使他成为以色列令人瞩目的重要人物。作为作家，他的文学创作深深扎根于他祖国跌宕起伏的历史中。在他的小说和纪实文学中都可以看到一条细察人性的主线，反映人性的脆弱却又尊重人性的多样性，将以色列动荡的政治和宗教风景展现给世界。《新闻周刊》评价他时说道：「奥兹是那样雄辩，富含人性关怀，甚至稍有宗教色彩。」

一个复杂的人，朴素庄重，为了真理不惜得罪任何人。」他的作品不仅在以色列十分流行，而且在欧美世界影响很大，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

奥兹曾获法国「文艺长官」称号。1992年获法兰克福和平奖。1997年，为表彰他的文学贡献，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授予奥兹名誉博士学位。1998年以色列建国50周年之际获得以色列国家奖。2004年，奥兹的新作《爱与黑暗的故事》一经在法国问世，便获大奖，2005年8月28日，值德国文学巨匠歌德生日之际，奥兹又从德国法兰克福市长手里接受了著名的歌德文化奖。歌德文化奖创立于1927年，是欧洲颇富盛名的一个奖项，每三年颁发一次，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作家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均是此奖得主。

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

权威性 时代性 经典性

我们需要一场告别上个世纪传统经典的新名著阅读运动

[日本] 大江健三郎 《愁容童子》《我在暧昧的日本》

[美国] 托妮·莫瑞森 《柏油娃娃》《最蓝的眼睛》

[美国] 苏珊·桑塔格 《中国旅行计划》《沉默的美学》

[美国] 奥利弗·萨克斯 《苏醒》《单腿站立》

[意大利] 阿利桑德罗·巴里科 《海上钢琴师》《用吉他射击的人》

[中国] 莫言 《天堂蒜薹之歌》

[英国] 汤姆·斯托帕 《乌托邦彼岸》《戏谑》

[西班牙] 罗莎·蒙特罗 《地狱中心》《女性小传》

[俄罗斯] 弗拉季米尔·马卡宁 《先驱者》《透气孔》

[墨西哥] 塞尔吉奥·皮托尔 《夫妻生活》《逃亡的艺术》

[以色列] 阿莫斯·奥兹 《鬼使山庄》《莫称之为夜晚》

[埃及] 哲迈勒·黑托尼 《落日的呼唤》《宰阿法拉尼区奇案》

《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编委会

总策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上海万语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总监修 大江健三郎

主 编 黄宝生

副主编 陈众议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刘象愚 朱书民 许金龙 庄 焰 吴正仪

陈众议 杨 雯 金 浩 宗笑飞 侯玮红

钟志清 徐维东 黄宝生 黄 梅 萧 萍

● 多元文化的并存与交流

——为未竟的“世界文学论坛”而作（代总序）

陈众议

◎缘起

这套丛书是未竟的“世界文学论坛”的一个分号。它缘起于大江健三郎先生的一次学术访问。那是2000年9月，大江先生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来到北京。这是1949年以来应邀来华访问的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用作家徐坤的话说，“他的意义将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彰显”。这显然是参照二十世纪初泰戈尔访华所留下的无形遗产而言的。大江先生在北京见到了心仪已久的莫言，并与王蒙、铁凝、余华、阎连科、徐坤等中国同行及社科院的学者和领导进行了亲切交谈并有感而发，提出了在中国举办“世界文学论坛”的动议。

这套丛书便是这一动议的见证。

◎意义

人类以并不乐观的状态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政治利益引发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碰撞乃至冲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然而，相信正义、博爱与和平的人们也在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热忱进行着消解冲突的努力。本丛书是这种努力的一个明证。

丛书为世界著名作家和中国读者搭建了一个平等对话、友好交流的平台。他们的著述将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众所周知，文化不同于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它是大到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小到一个地区、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某种共同的习性；这种习性，可以抽象为世界观，也可以具体为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特殊嗜好。总之，它是以有别于他人为前提的一部分人的共性。正因为这种特殊性，而且又是后天的，所以才有了不同文化间交流互补的必要和可能。实际上，不同规模的文化交流一直存在。交流是为了相互了解、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和平共处，而非倾轧或取代。

事实上，世界文化正是在相互了解、求同存异中不断演化、进步并形成今天这种大自然般赤橙黄绿青蓝紫杂然纷呈的多彩局面的。无论情愿与否，这种局面已经形成。我们希望它的未来没有血腥，而是不同文化友好交流、健康演化、取长补短、自我完善的过程。

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又注定要接受全球化浪潮的挑战。如何保护和发展人类文化生态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全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世界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耀眼明珠，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政治形态的形象反映，是各民族历史与现实、情感与意志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而恩格斯则认为，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人不可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但却可以通过文学感同身受地体察别人的生活、了解别人的世界。正因为如此，文学历来并将永远成为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增进理解的桥梁。

作为编译者，我们将努力使丛书成为文学的盛宴、和平的盛宴。盛宴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在近二十年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它将使我国读者感同身受地了解一批世界著名作家、文化名人及其斑斓的世界和关怀，而且对促进我国的文化建设也将不无裨益。

◎基数：为了拿来的甄别

话说有个印第安人居住在深山老林。一天，他有幸来到遥远的海边，看到集市上到处都在买卖舢板。于是，他也掏钱买了一条。他历尽千辛万苦把舢板带回家中，并学着海边人家的样儿把它供在房屋顶上；只不过别人屋顶上的舢板都是底儿朝天的，而他的舢板却仰面躺着。不久，天降大雨，盛满雨水的舢板压塌了房屋……这是一则古老的寓言，意思是别人的宝贝对自己未必有用，稍有不慎，非徒无益，而又害之。面对多元的花花世界，我们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呢？

难说我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然而，编译眼前这样一套体现多元文化的丛书有助于我们处理认知和估价、传承与创新、借鉴与自主、向背与审美的复杂关系。马克思关于席勒化的说法众所周知。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否定席勒的依据。马克思除了尊称席勒为“市民天性”的权威裁判，还援引席勒名言，谓“智者看不见的东西/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事实上，认识观和价值观是不可以划等号的；同样，进步和审美或者革命和美感，也是不可以划等号的。以马克思为例，他并没有因为他的价值观而影响他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之，也不因为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知而动摇自己的价值判断。比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而且为推翻资本主义这种剥削制度尽心竭力，但是他并不否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和发展趋势。他说：“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济全球化”吗？然而，马克思并不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历史趋势而放弃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则进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

辩证法的正确：意识对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与此同时，文学观念和形式的演变也为我们提供了复杂的课题。以二十世纪而论，一方面，文学在形形色色的观念（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驱使下愈来愈理论、愈来愈抽象、愈来愈“哲学”。卡夫卡、贝克特、博尔赫斯也许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而存在主义、现实主义和“高大全主义”则无疑也是观念的产物、主题先行的产物，它们可以说是随着观念和先行的主题走向了极端，即自觉地使文学与其他上层建筑联姻（至少消解了哲学和文学、政治和文学的界限）。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批评的繁荣和各种“后”宏大理论的自诩自说顺应了这种潮流。另一方面，技巧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到科塔萨尔的《跳房子》，西方小说基本上把可能的技巧玩了个遍。俄国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法国叙事学和铺天盖地的符号学与其说是应运而生的，毋宁说是推波助澜的（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小说的形式主义倾向）。于是，热中于观念的几乎把小说变成了玄学。借袁可嘉先生的话说，那便是（现代派）片面的深刻性和深刻的片面性。玩弄技巧的则拼命地炫技，几乎把小说变成了江湖艺人的把势。于是，人们对情节讳莫如深，仿佛小说的关键只不过是观念和形式的“新”、“奇”、“怪”。然而，古人不是这样的。中国小说的起源是轻松自如的故事情节（或谓“稗官野史”），而事实上《左传》及《左传》以降的诸多史书也是中国小说的策源地（是谓“文史一家”）。其中如《郑伯克段于鄢》、《曹刿论战》、《触龙说赵太后》、《蔺相如完璧归赵》以及《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屈原列传》等众多美妙的段子，其实都可以视作最初的小说，具有小说的基本因子：故事情节。诚然，由于道统对小说的轻忽，中国小说及小说史研究起步甚晚。一如鲁迅所言，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且必得到二十世纪），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在西方，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及小说史研究也是后来的事，但古希腊人对“类小说”的重视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便已然露出端倪。比如亚里士多德对文学（史诗、悲剧）的态度，其实已经体现了古希腊人对小说（情节）的重

视。亚里士多德视情节为文学的首要问题，认为它是一切悲剧的根本和“灵魂”。他还说“情节是悲剧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因此，《诗学》中差不多三分之一章节是有关情节的。在悲剧的六大要素中，情节列第一位，依次是性格、语言、思想、场景和唱词。当然，情节和故事原是不同的，情节或可说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故事，但绝对不是脱离故事的观念和技巧。过去的文学原理大都拿国王和王后的例子来说明故事和情节的关系，称“国王死了，两年后王后也死了”是故事，而“国王死了，深爱着他的王后便无法独自存活在这个世上，于是郁郁寡欢，最终成疾而终”则是情节。这就是说，情节是有血有肉的故事。当然，这是一种简单化诠释。倘使以《红楼梦》为例，两者的关系就比较明确了。因为，我们或可视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为故事，而家族没落与爱情悲剧则是其情节。诸人物的性格、形象、命运等等，在情节中逐渐演化并凸现出来。或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故事是两个世仇家族子女的爱情悲剧，而情节几乎可以说是整部作品。这样，在浪漫主义之前，情节对于文学，尤其对于戏剧、小说甚至史诗一直是精华要素，因而地位十分稳固。相形之下，主题却是后来才逐渐显露和凸现出来的。在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及其之前的文学中，主题是自然显露甚至深藏不露的。荷马史诗是行吟诗人的作品，其主体意识和主题思想是那样的淡然，以至于后人不得不在归属问题上煞费脑筋。而作品中的各色人等，无论是阿伽门农、奥德修斯、阿基琉斯还是帕里斯，个个都是英雄。是非、善恶等价值取向尚不在诗人（或行吟诗人们）考虑的要素之中。古希腊悲剧也是如此。我们的先人却不然。他们处理文史的方式似乎比较老到。司马迁之所以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原因，固然在其修史记事的抱负，但《艺文类聚》中《悲士不遇赋》所表现的悲愤和褒贬印证了他对历史及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倒确是“早熟的民族”。如今，当主题愈来愈成为诗人、作家首先考虑或急于张扬的要素时，亚里士多德的情节崇尚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首先，浪漫主义文学是比较典型的观念文学。浪漫主义把情节降格为小说内容的某个轮廓，认为这种轮廓可以离开任何具体作品而存在，而且可以重复使用、互相转换，可以因具体作者通过对人物、对话或其他因素的发展而获得生命。这基本上把情节降格到

了某些故事套路甚至于俗套的地步。即便如此，浪漫主义小说仍然没有抛弃情节。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惯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浪漫主义表现意志、宣扬观念的需要。马克思在评论席勒时，就曾称其作品为时代的“传声筒”。相对于“席勒式”，马克思自然更推崇情节的生动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完美融合的“莎士比亚化”。马克思的观点来自于他的立场和方法。他从不孤立地看问题。他关于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思考是对人类社会，也是对肉体与灵魂这对冤家矛盾的昭示。灵与肉、“道”与“器”，人类缺其一便不成其为人类。曲为比附，文学中的主题和情节也有点像人类的灵魂与肉体，二者不可或缺。然而，浪漫主义对情节的疏虞与现代主义对情节的轻视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经过现代主义（或者还有后现代主义）的扫荡，情节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以至于二十世纪的诸多文学词典和百科全书都有意无意地排斥情节、轻视情节，把情节当做可有可无的文学“盲肠”。于是，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小说创作中大行其道。于是，二十世纪的许多小说仿佛专为评论家而写，成了脱离广大读者的迷宫与瓊玑。虽然从文学创新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看，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存在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在西方，最早关注和凸现主体意识和主题思想的是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但最初的人文主义作家并没有因为强调主题而忽视情节。恰恰相反，无论是在莎士比亚还是在塞万提斯那里，情节依然是文学的关键。正因为如此，也因为受众的欢迎，他们一度受到经院作家的轻视，被冠以“通俗”。马克思从活生生的存在出发，但又不拘泥于存在本身。他像一位双脚踏入河床的巨人，在感受河水鲜活翻腾的同时，俯瞰人类文明之流从远古奔向未来。而他所选择的莎士比亚恰好是我假定的这个X（两条曲线）的交汇点。在这里，情节和主题是那么和谐、那么水乳交融。新鲜的人文思想和来自欧洲大陆，尤其是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和北欧的故事，天衣无缝地生成为美妙的情节。但这种和谐的、水乳交融的状态迅速被日益高亢的个人主义所扬弃。先是浪漫主义，后有批判现实主义。巴尔扎克等一代作家对资本主义（血淋淋的现实）的批判如此富有力度，以至于模糊了创作主体（如保皇派和革命派）的界线（恩格斯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胜利”）。在高扬的批判意识和价值取

向（或谓主题思想）背后，则是巴尔扎克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现代建筑师般的精确图景。用昆德拉的话说，这些精确的图景、过细的谋划使原本相对自由的小说创作形式改变了方向。再后来是以“科学主义”自诩的自然主义或把主题（包括人的几乎一切内涵和外延）和形式（包括技巧的一切可能与界限）推向极致的现代主义以及反过来否定（颠覆）和怀疑（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这些赤裸裸的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其实也是创作主体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鲜明表征，是当今世界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极端表现。倘使不是世界进入了跨国公司时代，新自由主义便无法生成；同样，倘使不是世界进入了跨国公司时代，西方的政治家也断然没有能力发明“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时鲜谬论。盖因跨国公司不会满足于一国或几国的资源。它们当然要消解各国主权，以致其剥夺在全世界畅通无阻。总之，比起我们过去总结的现代主义成因种种（如科技进步对形式变化或技巧翻新、世界大战对文学宣言或先锋思潮，等等），跨国公司所推崇的极端个人主义不是更具有说服力吗？无论接受美学如何重视读者（其实这里的读者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个人），无论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方面毫无时代意义（借镜作用）的真正意义上的通俗文学（以金庸、琼瑶作品为代表）如何受到欢迎，无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审美、认知、现实意义的所谓“通俗文学”（如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文学）怎样顽强地存活于我们这个世界，似乎都不能改变情节+主题——两条曲线所组成的这一个X。

然而，一如马克思，我们不该因为文学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脚步呈现出这样那样的规律而放弃人文应有的作用与反作用。何况文学终究是复杂的，它是复杂社会中人类复杂本性的最佳表征，也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主要缘由：为了拿来的甄别、为了借鉴的认知，即给读者一个基数，一个几经筛选的基数，一个尽量多元、多维的空间，既有西方和东方，也有新交和故人（如笔耕正健的大江先生和刚刚仙逝的桑塔格）；既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赓续，也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复归。

总之，我们以最简捷、也最深刻的方法请来了这十余位作家。希望读者在这一文学的盛宴中得到最大的欢愉和启迪。

● 中国梦与翘首期盼的中国行

——我所熟悉的阿莫斯·奥兹

钟志清

在整个生活与思维空间为撰写博士论文占满之际，为即将付梓的两卷本阿莫斯·奥兹作品集作序让我有些感到不堪重负，这主要是因为身为博士候选人，在难获文科博士学位国家之一的以色列的希伯来文学系读书，难免感受到一种沉重的压力，但是，出于对辛苦筹备世界作家大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同人和译者履行承诺的义务，我又无法推却，于是提笔与读者共话日渐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所喜爱的以色列优秀作家阿莫斯·奥兹及其创作，结果，竟在暗夜行路中感受到某种愉悦。

阿莫斯·奥兹是是目前以色列文坛最具有影响力的优秀作家之一，也是最具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迄今已发表了十一部长篇小说《或许在他方》（1966，中译本《何去何从》）、《我的米海尔》（1968）、《触摸水，触摸风》（1973）、《完美的和平》（1982）、《黑匣子》（1987）、《了解女人》（1989）、《第三种状态》（1991，英文版 1993）、《莫称之为夜晚》（1994）、《地下室中的黑豹》（1995）、《一样的海》（1998）、《爱与黑暗的故事》（2002）；三个中短篇小说集《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一直到死》（1971）、《鬼使山庄》（1976）；杂文、随笔集《在炽烈的阳光下》（1979）、《在以色列国土上》（1983）、《黎巴嫩斜坡》（1987）、《天国的沉默》（1993）、《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和平》（1994）《故事开始了》（2000）；儿童文学作品《索姆哈伊》（1978）等。

奥兹 1939 年生于耶路撒冷，父母在排犹声浪在欧洲四起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影响，分别从俄国和波兰移民到当时的巴勒斯坦。父亲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博学多才，嗜书如命，懂十几门语言，

一心向往做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但始终未能如愿。母亲范尼娅漂亮贤惠，多愁善感。奥兹在英国统辖下的耶路撒冷度过了充满幻想的童年时代，他在回忆自己童年经历时曾经说：“父母将我送到一座希伯来基础小学，学校教我缅怀古代以色列王国的辉煌，并且希望它在烈火与热血中复兴。”在那个喧嚣躁动、英雄神话与日常生活混为一谈的时代，奥兹的理想是“做一个英雄”。

十二岁那年，母亲不堪忍受缺乏色彩的生活自杀身亡。这一事件不仅结束了奥兹童年时代的美好梦想，而且对他心理意识的形成及日后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奥兹本来就和父亲经常发生争执，母亲故去后，他对家庭的反叛意识愈来愈强。十四岁那年，奥兹离家投身到胡尔达基布兹（指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并把自己的姓氏克劳斯纳改为奥兹（希伯来语意为“力量”）。在那个颇带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世界中，开始了创作生涯。后来，基布兹将奥兹保送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文学与哲学学位，毕业后到基布兹任教。功成名就后，奥兹又获得机会到英国牛津大学深造，获硕士学位。1997年，为表彰他的文学贡献，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授予奥兹名誉博士学位。奥兹现居住在坐落在南方沙漠中的小城阿拉德，是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终身教授。

奥兹自幼受家庭影响，阅读了大量希伯来语经典作家及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表现出出色的文学天赋。在希伯来传统文学中，奥兹酷爱《旧约》中优美、简洁、凝练、具有很强张力的语词，他一直试图在创作中保留住这种传统。此外，奥兹对以色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格农和布伦纳、别季切夫斯基等现当代希伯来文学大家备加推崇。阿格农小说中娓娓动人的叙述方式，使奥兹深受启迪，他喜欢用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展现出当代以色列人的社会生活与喜怒哀乐。而且，欧美文学、俄苏文学，尤其是十九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一批小说家如果戈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的作品，对奥兹影响弥深。他描写恐惧、负疚、罪与罚及诸多非正常思维状态下的人类情感，把一个个复杂而血肉丰满的活生生的原形人物托到读者面前。他像许多现代作家一样，喜欢使用象征、隐喻、暗示等手

法，其作品意象深邃，词汇意义丰富，具有许多层面。作为“新浪潮文学”创作中杰出的代表，他把笔锋伸进玄妙莫测、富有神秘色彩的家庭生活，引导读者一步步向着当代以色列家庭生活内核切近，窥视到当代以色列人生活的本真和犹太人的思想意识。其文本背景多置于富有历史感的古城耶路撒冷和风格独特的基布兹，展示出以色列人特有的社会风貌与世俗人情，突现茫茫无垠的内盖夫沙漠、风雨中飘摇不定的耶路撒冷古城、狂热冲动的基布兹社会、沐浴在文明之光下的特拉维夫等别具一格的以色列自然风光，形成典型而突出的以色列特色。他的作品不仅在以色列十分流行，而且在欧美世界影响很大，被翻译成 30 多种文字，曾在许多国家获多种文学奖，其中包括 1998 年以色列建国 50 周年之际颁发的以色列国家奖。2004 年，奥兹的新作《爱与黑暗的故事》一经在法国问世，便获大奖；2005 年又在德国获得“歌德文化奖”。

令奥兹在以色列名噪一时并奠定其国际地位的作品是发表于 1968 年的《我的米海尔》。小说采用女性话语，丰富地表达出女性意识和女性心理特征，在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该书用第一人称形式写成，通过女主人公汉娜的眼光观察世界，感受人生。汉娜是一个充满浪漫幻想的新女性，自幼想嫁给一个举世闻名的学者。在一见钟情的情况下，同希伯来大学地质系大学生米海尔结为伉俪。米海尔虽然称不上才华盖世，但却勤勉用功。由于生活压力、性格差异、对家庭幸福概念的不同理解、汉娜本人的心理障碍与性格弱点等诸多原因，这对年轻人之间逐渐产生裂痕。汉娜不禁失望、痛苦、歇斯底里，终日沉湎于对旧事的追忆，在遐想的孤独世界里尽情宣泄着自己被压抑的期待和欲望。到小说结尾，已明显暗示出汉娜会自杀。《我的米海尔》所开创的“婚姻悲剧”或者说“家庭悲剧”模式在奥兹日后创作的《黑匣子》、《了解女人》、《莫称之为夜晚》等几部长篇小说中得以沿袭并创新，在以色列文坛别立一宗。

《莫称之为夜晚》的中心主人公西奥和诺娅是没有结婚但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一对情侣。诺娅比西奥年轻 15 岁，他们在富有异国情调的中美大陆相识，西奥放弃了当时一份比较重要的工作，追随自己的梦中情人诺娅来到令

他神往的以色列，住在沙漠边缘的一座小城泰勒凯达尔。年逾花甲的西奥在自己的国家从事小镇规划工作，不缺乏荣誉，但缺乏工作意义。诺娅则在中学教英语文学。同奥兹以往的家庭小说相比，西奥与诺娅似乎显得更加不满于现状。造成二人心灵隔阂与关系淡漠的原因不在于年龄差距，而在于生活志趣与人生价值取向的不同和生活环境的逼仄。居住在尚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沙漠小镇，缺乏娱乐与消闲机会，这种没有距离没有新意的生活让长期厮守的情侣互相产生不满与厌倦。曾经身为战争英雄的西奥在只有风卷沙尘但没有激情火花的生存境况中感到失望，性格变得谨小慎微，诚惶诚恐，苟且顺从。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使得精力充沛、积极进取、不屈不挠的诺娅心生怨愤，进而加剧了自己对没有孩子的夫妻生活产生不满，有时竟然借和同事发生性关系来弥补心灵的空虚，后来逐渐将兴趣转移到帮助从俄罗斯移民来到以色列的音乐家开拓事业上。

按照奥兹的创作习惯，他不会像当年轻作家那样仅将笔锋停留在情侣二人世界空间内，作品所展示的意义远远超过情爱悲剧本身。小说中透露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色列社会所面临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边缘话语与主体意识、欧洲非洲中东文化碰撞的冲突与悖论，而这一切，则借助于沙漠边缘小镇这一空间场景象征性地体现出来。

此外，小说的语言富有诗意美，掩卷之后，星光灿烂、寂寞凄清的沙漠之夜和情人间没有硝烟的战场依旧会徘徊在你的脑海，令人唏嘘慨叹。这大概就是奥兹作品的内在魅力之所在吧。

《鬼使山庄》由三个凄美动人、相互关联的短篇小说组成，曾在以色列获“比亚利克奖”。三个短篇小说的背景均置于耶路撒冷古城的郊区，第一个短篇小说《鬼使山庄》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方式，主要人物“父亲”汉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移民巴勒斯坦，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希望与幻想，岁月荏苒，他在巴勒斯坦娶妻生子。小说开卷，正值英国在巴勒斯坦统治即将结束的前夜，从医的“父亲”在看电影时抢救了英国高级官员那突然昏厥的嫂子，故而收到一张带有感激色彩的烫金请柬，携家眷出席在高级官员官邸举行的五月舞会。不料，这次富有戏剧性的舞会竟然悲剧性地改变了他的